

《放鹄行》与“中国绿孔雀之乡”

——双柏县的生态守护与文化遗产

□金伟

《放鹄行》中闪耀的生态智慧与廉政光芒

周冠南的《放鹄行》以质朴而真挚的笔触，记录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生态保护实践。诗中描绘的场景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我见到庭前，小鸟群踉跄。观看裂心肝，听之滋不乐。阶下有庖人，磨刀响霍霍。”

面对笼中惊恐不安的鸟儿和厨房中磨刀霍霍的场景，周冠南心生怜悯：“我即提笼起，爱护心生恪。”他不仅将鸟笼悬挂檐端以防猫袭，更在次日“诘朝开其樊，纵之返寥廓”，让健康的鸟儿重返自然。对于体弱无法立即飞翔的个体，他更是悉心照料：“收之青竹笼，不使鹰鹯搏。饮啄养羽仪，放汝免燔灼。”

这首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对鸟类个体的救助，更在于对生态系统的深刻认知。周冠南在放归鸟儿时谆谆嘱咐：“勿伤禾与黍，勿近雕与鸢。雕鸢恣击噬，伤禾罹殍殍。”这简短数语揭示了生物链相互制衡的规律，体现了朴素的生态系统观念。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以此为契机改革旧制：“寄语送鹄人，此例从今削。”明确废止了这项

“残物扰民”的陋习，展现出将生态意识转化为制度保障的治理智慧。

《放鹄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生态意识，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刻廉政思想。周冠南在诗中敏锐地指出，捕鹄送礼的行为实则是“上官味异珍，网罗遍林壑”的结果——上级官员对珍奇异味的追求，导致基层百姓不得不“计程三百里，输送劳行脚”，甚至因“中途毙三禽”而“惧罪心惊愕”。这种洞察揭示了官僚体系中的奢靡之风如何转化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民众的压榨。

面对这一陋规，周冠南的回应铿锵有力：“岂忍恣口腹，付厨供大嚼。”他不愿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牺牲自然生灵，更不愿助长这种劳民伤财的官场风气。在诗作结尾，他更将生态保护与为官之道相联系：“牧民亦如此，循事天理自宽绰。”——治理百姓如同对待自然生灵，遵循天理方能心境宽广。这种将生态伦理与廉政思想相融合的理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超前。

双柏交出的生态答卷

周冠南在《放鹄行》中体现的“仁民爱物”思想，既源于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兄弟”的传统观念，又与儒家“仁政”思想相通。这种跨文化的生态智慧，在今日双柏的绿孔雀保护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当地将现代保护理念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楚雄模式”。

双柏的绿孔雀保护之路，堪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早在2003年，楚雄州就以抢救性保护措施划定了10391公顷的双柏恐龙河州级自然保护区，当时该区域分布着约50只绿孔雀。到了2020年，保护区新增划入面积7143公顷，总面积达到17534公顷，使全州85%以上的绿孔雀种群得到严格保护。2023年，双柏恐龙河保护区被国家林草局认定为首批绿孔雀重要栖息地，标志着保护工作获得国家级认可。

双柏县的绿孔雀保护不仅体现在保护区面积的扩大，更展现在科学保护体系的构建。

当地建立了立体化监测网络，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及礼社江、绿汁江绿孔雀分布区域布设监测样区22块，面积达127542亩，布设监测样线31条总长101.92公里，

安装红外相机428台。这套系统如同为绿孔雀装上了“智慧护甲”，实现了对种群的严密监控。

更值得称道的是双柏县对绿孔雀栖息地的系统性修复工作：清理整治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建设项目15个，停止水电站建设；永久性封堵矿井口14个，恢复植被面积约60.9亩；在绿孔雀集中分布区架设引水管道76.5公里；建成绿孔雀饮水补充点51个、投食台30个、沙浴池24个；建设绿孔雀迁徙扩散生态廊道7条，修缮巡护步道20.5公里。

这些举措不仅改善了绿孔雀的生存环境，也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深入实践，与周冠南诗中“勿伤禾与黍”的朴素生态观形成跨越世纪的呼应。

在生态保护中，双柏县创造性地建立了“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效机制，并通过多种形式转化为全民行动：成立全国首个绿孔雀保护生物多样性信用研究站；设立全国首个绿孔雀家园法律保护巡回审判点和公益保护示范点；将“双柏县绿孔雀家园法律保护”举措写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报告》。

诗文新镌将为绿孔雀之乡注入人文之光

时隔70年后，周冠南的《放鹄行》通过其子周善甫的书法艺术获得新生。1994年端午节，年届八旬的周善甫先生用自创的“简草体”重新书写了其父的这首诗作。

在卷尾，他深情题跋：“先父殿卿公，讳冠南，曾于20年代为双柏宰，此诗乃当时咏实之作，其仁民爱物之志固跃然纸上也。敬录一过以应楚雄博物馆鼎建证书，盖亦足为倡廉及保护鸟类之先例焉。”这段文字不仅阐明了诗作的创作背景，更点出了其父在廉政建设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双重价值。

将周善甫先生书写的《放鹄行》书法作品镌刻成石，立于双柏县查姆湖畔，具有多重现实意义，是生态守护与文化遗产的完美结合点。

首先，它将成为生态文明的象征载体。在双柏县查姆湖畔将诗文刻石，可将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态成就完美融合。查姆湖作为双柏县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公众接受生态教育的理想场所。

其次，它是廉政教育的生动教材。诗中“此例从今削”的坚决态度和“牧民亦如此，循事天理自宽绰”的为政之道，为当代公职人员提供了廉洁自律的精神滋养。在诗刻旁设置解读铭牌，结合周冠南在双柏废除陋习、恢复县名等史实，可让参观者深刻了解勤政廉洁的历史传承。

再者，它完成了历史文脉的当代表达。诗刻将完成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从周冠南放归火鹄的善举，到周善甫先生重书其父诗作的用心，再到双柏人民守护绿孔雀的壮举，形成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这种传承对于增强地方文化自信，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今年5月，一份来自省文联同志们的建议，让尘封百年的诗篇重新焕发生机。他们特别提及民国初期曾任双柏县宰的纳西族教育界前辈周冠南先生及其撰写的《放鹄行》，认为这首诗作在生态保护及廉政建设方面具有深远的时代教育意义。他们建议深入了解这首诗作，研读云南农业大学木基元教授此前的有关研究文章，并特别提议将周冠南先生之子，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周善甫先生书写的《放鹄行》书法作品镌刻成石，置于双柏县合适位置，让这一承载生态智慧与廉政精神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新生。

这一建议背后，是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渊源。1922年秋，获得辛丑恩正并科云南贵州两省乡试合闱第六名的高排名，又留学日本弘文书院归国的周冠南赴任双柏县知事。这位来自丽江的纳西族官员刚上任便面临一项关乎生态与民生的抉择。当时，该地区的乡绅按照“节礼年年若”的旧例，为新任县宰送去两笼珍禽“火鹄”作为接风贺礼。面对这份当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心意”，周冠南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他不仅拒绝收受礼品，更将笼中之鸟全部放归自然，并写下了警醒后人的《放鹄行》诗篇。这一举动在官场陋习盛行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其背后的生态意识与廉政思想穿越时空，与当代双柏县“中国绿孔雀之乡”的生态成就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周善甫先生
云南省书法家协会供图